

---

# 孙中山与近代法国

陈三井

---

## 一、前言

有谓孙中山出生于夏威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sup>①</sup>,由于他自述革命的思想渊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sup>②</sup>加上其谋国远识之大,坚持理想与灵活运用之政治手腕,亦曾为外国学者推崇为世界的公民<sup>③</sup>或世界政治家<sup>④</sup>。

有关孙中山的研究,无论两岸三地,还是欧美日各国,都称得上硕果累累,美不胜收;至其与法国的革命情缘,则已有欧美学者

---

① 参见李又宁《孙中山先生的美国公民权——英文史料锥见一二》,《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411页。李又宁介绍 Thomas W. Ganschow 教授的论文,由美国移民局、美国国务院的档案资料,透过孙中山的答话,证明孙中山在夏威夷出生,并取得美国公民权。根据孙中山的证词,他于1870年11月24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 Waimanu 地方出生。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页)已指出,这是孙为便于入境,特意编造出来的。

②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

③ 葛立格:《孙逸仙——世界的公民》,《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台北,1981年,第98—121页。

④ 史扶邻:《孙逸仙之世界政治家角色》,《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1985年,第205—211页。

如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ère)<sup>①</sup>、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sup>②</sup>、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sup>③</sup>、金姆曼荷兰德(Kim J. Munholland)<sup>④</sup>、杰弗里·巴洛(Jeffrey G. Barlow)<sup>⑤</sup>、林如莲(Marilyn A. Levine)<sup>⑥</sup>以及两岸学者吴乾兑<sup>⑦</sup>、沈自敏<sup>⑧</sup>、张振鹄<sup>⑨</sup>、陈三井<sup>⑩</sup>、许文堂<sup>⑪</sup>等人,利用个别的档案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就不同的时期,做出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本文对此不拟赘述。

本文的第一个切入点,是想探讨孙中山对法国大革命的整体认识,包括对若干启蒙运动者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1689-1755)、福祿特尔(伏尔泰, Voltaire, François

---

① 巴斯蒂相关论文有: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Avril-Juin 1969; 《法国的影响及各国共和主义者团结一致: 论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② 白吉尔:《二十世纪初法国对孙中山的政策——布加卑事件(1905—1906)》,《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

③ 史扶邻著、邱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Kim J. Munholl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 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 1972, 林礼汉译文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4 辑。

⑤ Jeffrey G. 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黄芷君译文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6 辑。

⑥ 林如莲:《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 2 册。

⑦ 吴乾兑:《1911—1913 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辛亥革命期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5 集。

⑧ 沈自敏:《辛亥革命与法国》,《外国史知识》1981 年第 9 期。

⑨ 张振鹄:《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

⑩ 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台北,1971 年 6 月;《法文资料中所见的孙中山》,《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1975 年 11 月。

⑪ 许文堂:《孙中山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和党务组织》,“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 年 8 月。

Marie Arout, 1694– 1778) 等人的论评, 以及对《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的推崇, 从而推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与法国政制对主张‘取法西方’的孙中山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切入点, 也许是过去较少人注意的两个焦点: 一是寻找孙中山对民初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所倡导的以法国为主的旅欧教育运动的看法和支持; 一是重建中国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党部时代, 孙中山派人到法国组党从事活动的若干史实。这两部分涉及法国现代性与重要性的扩散, 在在引导并支配孙中山做出决定, 而且影响其行动, 故亦应兼而述之, 期使观照面更加广泛, 更为完整。

## 二、孙中山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法国大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的历史并非专属法国, 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sup>①</sup> 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信息在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 抵达北京时(1793 年 8 月) 已传到清廷, 但是并未引起任何的反应。<sup>②</sup> 真正透过杂志报纸的宣传和报导, 对中国有日益增长的影响, 则已到 20 世纪初同盟会成立之前。长期在香港、夏威夷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 对法国大革命自是不陌生。1887 年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校转入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肄业时, 日间研习科学与医学, 夜间则攻读中文或其他的书籍, 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 1809– 1882) 进化论等名著, 尤所爱读。当时孙中山所读的法国革命史, 是英文蓝皮译本。<sup>③</sup>

孙中山说过, 法国革命经过了 80 年, 才能够成功。法国革命是

---

① 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 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第 79—80 页。

② 张芝联:《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1889—1989)》,《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第 118 页。

③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第 31—32 页。

以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鼓吹民权思想为前导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孙中山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 (一) 对启蒙运动大师的论评

像王韬、严复、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样,孙中山对几位启蒙大师大致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其中论列较多、最加推崇的是孟德斯鸠。孙中山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sup>①</sup>又说:“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倡自法儒孟德斯鸠,君主民主立宪国奉为金科玉律。”<sup>②</sup>

孙中山进一步探究孟氏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认为孟氏乃根据英国的政治习惯,草成此种三权分立主张,著了一部书叫《法意》(*L'Esprit des Lois*),有人亦叫做《万法精义》,发明了三权分立底学说,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就影响来说,孙中山以为孟氏发明三权分立学说未久,“就有美国底革命,订定一种宪法。美国即根据孟氏底三权分立学说,用很严密底文字订立成文宪法……后来日本底维新,及欧洲各国底革命,差不多皆以美国为法订立宪法。”<sup>③</sup>换言之,孟氏的三权分立说,影响美国及各国宪法,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在西欧仍然不足,“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sup>④</sup>,所以加上中国原有的监察、考试二权,而主张五权宪法。

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经常拿法国当例子的是民权主义的几讲。梁启超醉心卢梭的思想,认为近代西方的政治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受卢梭《民约论》(*Le Contrat Social*)的影响所产生的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国父全集》第2册,第356页。

② 孙中山:《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国父全集》第2册,第417页。

③ 孙中山:《五权宪法讲演录》,《国父全集》第3册,第237—238页。

④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国父全集》第1册,第118页。

效果。<sup>①</sup>他特别强调,“卢梭之倡天赋人权……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sup>②</sup>

与梁启超的抽象式肯定,笔端充满感情相比,孙中山便显得冷静务实多了。他是这样介绍卢梭的:“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有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了。所以这种言论,可以说民权是天生出来的。”<sup>③</sup>

孙中山对天赋人权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它不是天生出来的,而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所以批评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和历史进化的道理相冲突。<sup>④</sup>与专制君主争民权,虽是发生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辛亥革命寻找合理化的一个理由,但孙中山仍时时以法国大革命为教训,不希望滥用民权、革命行为过于暴虐,使反革命的人受到大害。

尽管孙中山对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有一些质疑,但还是肯定卢梭的历史作用,推崇他的提倡民权,“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孙中山对另一位启蒙大师福禄特尔,便著墨较少。在1903年发表的《驳保皇报》中,孙中山对保皇派虽提到“经卢梭、达尔文、福禄特尔诸大哲提倡建设”,但对他们对诸大哲实有误解之处,曾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一无所知,于政治学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所引

---

① 元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台北,1966年12月,第69页。

② 沈坚:《中国近代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88—89页。

③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第1册,第62页。

④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第1册,第63页。

西事,牵强附会”,特别是对《隆记报》主笔陈仪侃大书特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提出反驳,指出“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其第一出版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1859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十余年后始见重于英之学者,又十余年后始见称于世人。”<sup>①</sup>孙中山言必有据,其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 (二)对《人权宣言》的推崇

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是领导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广大城乡人民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之后,为谴责旧制度,阐明其新的社会、政治纲领而发表的。在这个意义下,它无异是旧制度的死亡证明,又是新体制的出生纸或计划书。宣言的起草者在18世纪哲学家们思想的启导下提出了一整套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各项原则,即著名的1789年原则,为近代世界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铺设了理论基石。<sup>②</sup>

孙中山对这个继美国《独立宣言》之后的法国《人权宣言》,有极大的推崇和无限的憧憬,他说:“但法兰西《人权宣言书》出后,自由、博爱、平等之义,昭若日星,各国法律,凡属人类,一律平等,无有阶级。其有他国逃奴入国者,待以平民,不问其属于何国。”<sup>③</sup>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孙中山不仅常常加以引用,与三民主义对比,并且有很具体的解释。兹综合其看法,分述如下:

1、孙中山首先指出,“自由”、“平等”是欧美近100年来的两大革命思想,法国革命又加上了“博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有助于推动和壮大法国革命,因而也有助于中国国民革命。

① 孙中山:《驳保皇报》,《国父全集》第2册,第242—243页。

② 王养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与1789年原则》,《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63页。

③ 孙中山:《飭内务部通飭所属禁止买卖人口令》,《国父全集》第6册,第36页。

2、孙中山又用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来解释他提倡的三民主义，指出三民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他在解释自由、平等、博爱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时，比较的说，“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民幸福；为四万万人民谋幸福就是‘博爱’”。

3、孙中山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倡者是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sup>①</sup>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用深入浅出、大众可理解的话语，拿法国革命家喻户晓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来与他新提倡的三民主义相比拟阐扬，虽不无用法国大革命来为自己革命主张服务的想法，并多少有点简单化和片面性，甚至和维新派一样流于口号化，但总体而言，在继承中亦有创发，内容较富新意，并具中国特色，较之维新派有意贬低法国大革命，甚至几乎持全盘否定的论调，已较显进步、深刻。

### 三、孙中山与民初旅欧教育暨国民党在法的组织活动

民初旅欧教育运动，系由具旅欧、留法背景，并富有政府主义色彩的若干同盟会志同道合之士，如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汪精

---

① 陈崇武：《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自由、平等、博爱观》，《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00—101页。

卫、张继等人所倡议,鼓励学子到法国、比利时等国留学,或以工兼学,旨在扭转自清华留美以来‘美雨压倒欧风’的留学热潮,让欧美学术运河平均输灌,其终极关怀在沟通东西文明,融合中外学术,另创一种新文明,为人类开一新纪元。<sup>①</sup>

旅欧教育运动的内涵,广而言之,应溯自‘留法俭学会’,历经‘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包括华工教育,兼及北京中法大学、巴黎中国学院、里昂中法大学、比利时晓露槐(Charleroi)中比大学的创办等事业,前后衔接,国内外学术联成一气。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或亡命海外,或南下广州护法,或困居上海专心著述,席不暇暖,对于这段期间从‘留法俭学会’的成立到派遣华工参加欧战,乃至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如火如荼展开,显然不是他的注意焦点,因为遍翻《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或《国父年谱》,相关资料仍属凤毛麟角,不易建构出一幅完整的图像,难能清晰描绘出孙中山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方面之法、英、俄三国因国内壮丁大多调赴前敌,厂工缺乏,农务废弛,于是先后到中国大批招募华工,或任木材砍伐,或在矿山工作,或参与军火制造,或支援后勤运输,于上述三盟国人力资源之补充,贡献甚大。<sup>②</sup>

华工出国‘以工代兵’参加欧战,除了政治动机外,社会经济的因素当也在考虑之列,诚如李石曾所主张,其可裨益于国人者有三: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知识;三曰改良社会。<sup>③</sup>孙中山虽然反对中国参加欧战,但对于华工返国效力,倒是持肯定的态度。1919年4月14日复函旅法华工许道生,对他拟在法国组织华工团体的计划表示赞许,并指出‘年来国中多故,共和政治屡受暴力

---

① 吴稚晖:《海外中国大学未议》,陈三井编:《勤工俭学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

② 参阅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2),台北,1986年6月。

③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第12页。

所摧残，虽由武人专横，亦因国中大多数之劳动界国民不知政治之关系，放弃主人之天职，以致甘受非法之压制、凌侮而吞声忍气，莫可如何也。’最后他认为‘感受世界最新之潮流，又得练习最新之科学工业常识的数十万侨胞联袂归来，为宗邦效力，则祖国实业前途之发展、民权之进步，又岂有限量。’<sup>①</sup>此时孙中山正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实业计划的宏观亦已成型，自是对有实业经验的十多万华工寄以厚望！

孙中山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所发起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基于公利——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和私谊——双方的交情，在精神上是支持的。支持表现在下列三件事上：

### （1）对创设西南大学的支持

西南有创办大学之议，首先由陈炯明于1919年9月21日公开发起，钮永建、邹鲁等人相继响应赞同。在酝酿初期，曾建议以关税余款一百万元，充作学校开办费，曾获得孙中山、唐继尧的赞成以及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的首肯。不料西南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西南大学大纲》时，因受李石曾、吴稚晖的影响，竟然明定“本大学设本部于上海，酌设分部于海外”，并除汪精卫、章士钊外，增聘吴稚晖、李石曾为里昂海外部筹备员，黄炎培为南洋海外部筹备员，因而引发一场校址之争。<sup>②</sup>

孙中山虽然支持西南大学的创设，但在校址的选择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颇令人关心。这时候孙中山人在上海，3月中旬有两名学生领袖黄辉（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与陈肇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偕往法租界环龙路寓所拜访，谈及西南大学校址事，孙中山主张该大学应在广州创设，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同，“但谓宜先设法赶走该处之广西（桂系）军人方好，否则一经大学创成，必即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9—1170页。

② 参阅陈三井《民初西南大学之倡设与弃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台北，1990年6月。

为伊等势力所盘据,生种种之障碍,将设如不设!<sup>①</sup>

## (2) 对在法国建立海外大学之支持

孙中山因受李石曾等人的影响,对在法国里昂创设海外中国大学的支持亦不遗余力。1919年,孙中山与唐绍仪曾联名致函政务会议,请拨款补助拟在法国建立之中国大学。此一长函,很像李石曾口吻,大致要点如下:

(A) 年来勤工俭学生赴法者,极为踊跃;而法人待之,亦甚为殷挚。

(B) 中国大学之成立,于教育方面收效宏大,而于退还赔款之进行,关系尤巨。中国于海外自建大学,于教育前途,为利至溥。

(C) ‘自民国肇造以来,政本未安,奸宄屡作,民生疾苦,日以加甚;一线之望,惟在民心之未死,民智之渐开。而盈虚消长,实系于教育,教育之道,条理万端,以目前学校之未备,人才之难遇,国外大学之建议,实所以补其缺乏,应其需要,此为根本大计,诚不宜忽。’<sup>②</sup>

创建海外大学既如此重要,复有法国政府及里昂各界之热心配合,势不宜迟,故特陈请政务会议,拨款30万元。于是政务会议核定于西南大学的建校款100万元中拨30万为里昂部筹备项,常年款70余万,20万元归里昂部。这个结果无异是陈炯明、邹鲁等人播种,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收获,也可以说是吴、李反客为主,借西南大学之“腹”生里昂中法大学之“子”的绝妙好计。<sup>③</sup>

## (3) 明定里昂中法大学为广东大学海外部

里昂中法大学于1921年10月创办开学,广东大学于1924年2月合并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

① 《孙中山之西南大学校址谈》,1920年3月15日《申报》。

② 孙中山:《与唐绍仪联名致政务会议请拨款补助拟在法国建立之中国大学函》,《国父全集》第5册,第187—189页。

③ 陈三井:《民初西南大学之倡议与弃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第370页。

门学校而成立。<sup>①</sup>缘里昂中法大学设立之初,原定为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后因广东大学一时未能成立,海外部学生无从附丽,以致经费异常缺欠。经广东大学校长呈报后,孙中山于1925年2月6日核可,明令将里昂中法大学依照原案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及确定管理权责,并永远不能将现有经费的款内应得之额变更。<sup>②</sup>

除上述数事,孙中山曾留下公文档案,明确表示一定的支持外,尚有一件与中法文化教育有关之事,值得一叙。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金融家艾米奇德因不忍见大多数巴黎大学生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特透过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奥诺哈(André Honnarat)的大力支持,终于陆续建造了一个由法国捐地、各国捐款,可容纳数千人住宿并活动的大学城(Cité Universitaire)。<sup>③</sup>曾任法国总理、时任巴黎中国学院院长的法国科学家班乐卫(Paul Painleve, 1863-1933)为此曾于1922年1月12日致函孙中山,请赞助巴黎建造大学城。函中有云:“里昂方面办理勤工俭学事业,巴黎方面创设中国学院新基,敝人承乏该院院长,谅阁下早有所闻……巴黎市政厅及巴黎大学现发起万国大学村庄(即大学城),英、美、加拿大、挪威、瑞典等国均将在此盖造各该国学舍,余代中国学院捐得建筑新院地基一块,约值三百万佛郎,此实为万国学界合为一家之创举。相形之下,中国方面似宜自树相当之威严,维持国体之位置,无待鄙人赘述。鄙意以为:中国不论南北,不论党派,凡乐与西方学界接近之分子,均当赞成此种盛举。鄙人酷爱中华民国,深信其前途远大,故敢于阁下从公匆忙之际进

①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6),台北,1988年6月,第2页。

② 孙中山:《觐知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国父全集》第7册,第493—494页。

③ 胡引玉辑译:《巴黎国际大学城——地球上的理想国》,1996年10月4日台北《民生报》。

言,以渎清听。”<sup>①</sup>

此函由巴黎中国学院监督韩汝甲转达,孙中山在生前曾否得阅?阅后有何反应?均不得而知。所可确定的是,大学城中国馆的基地已由班乐卫代为选定,建筑蓝图并已由里昂中法大学学生虞炳烈设计完成,遗憾的是南北分裂的中国政府最后并未赞助此一美举,巴黎大学城独缺中国馆,这未尝不是中法文教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

至中国国民党透过总务部,派遣王京岐(1894—1925)到法国发展党务的活动经过,笔者已有另文发表<sup>②</sup>,不拟赘述。

在此所要说明的,王京岐虽是孙中山所派遣,但其间系透过总务部长居正之介绍,平常王氏致函联络的是总务部的孙镜(铁人)与郑达佛两人。在台湾阳明书屋(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所藏的上海环龙路党部资料中,虽发现有数封王京岐致孙中山的函或报告,但迄今尚未找到有孙中山复王京岐的函,所以无法建构孙中山对法国党务活动的一些看法或如何重视支持的意见。在《国父全集》中仅发现一份孙中山的委任状,其内容是:“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此状。总理印。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署。”<sup>③</sup>

在国内中国国民党的一片“容共”声中,王京岐为了开展党务,在法国也做了一项类似的重大决定。他与代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人商谈合作,有意引其加盟入党,其理由是该“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而请总务部裁示。《国父年谱》刊载了1923年7月19日总务部长彭素民的复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班乐卫请赞助巴黎建筑万国大学村庄致孙中山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② 陈三井:《王京岐在欧洲的组党革命活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册,第308—325页。

③ 孙中山:《委任王京岐等职务状》,《国父全集》第8册,第570页。

函云：‘查国内该团团员已有多数加入本党，则对于旅欧该团亦自不须拒绝。惟须于入党之初，询其以后是否在本党主义之下活动；若不能与我步调一致，则是无合作之益，而有混乱之害，此层请特别注意为幸！’<sup>①</sup>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由彭素民具名复函，但显然不是他个人单独所能决定的，这不仅代表孙中山当时的‘容共’政策，亦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容共’的基本态度。

## 四、结 语

在武昌首义前，孙中山曾三度访法，虽然每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整体而言，对法国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我们若熟读三民主义，大概可以为孙中山对法国的影像，拼图如下：

(1) 法国人是拉丁民族，系拉丁民族在南欧所建立的最大国家。

(2) 法国人口四千万，以农立国，国家富庶，人民家给户足，每日都讲究快乐。

(3) 法国是世界四强(英、美、法、日)或五强(英、美、法、日、意)之一；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是法国，法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的。

(4) 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5) 欧美崇拜卢梭为民权中的圣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

总之，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法国是西方一个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先进民主国家，较为接近他的革命思想。犹忆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一文中说过：

法兰西之革命，尊人权、贯自由平等之精神，于政治、

<sup>①</sup> 《国父年谱》下册，第1089页。

社会、经济生一大变革。世界所以有今日之进步者，  
法兰西之革命为之也。<sup>①</sup>

其后，陈独秀亦曾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文章中特别强调，近代文明的三种特征：人权说、生物进化论与社会主义，皆拜法兰西人之赐，他甚至说：“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sup>②</sup>

孙中山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陈独秀讲得那么明白、露骨，但就是这种法国现代性的文明影像，法美连体婴似的共和制，平等自由快乐的法兰西人，成为中国革命者或“五四”型知识份子赞扬、憧憬、模仿和效法的对象，孙中山亦不例外。

孙中山的“取法西方”，主要的精神乃是要“以法为师”。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工作，《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响亮口号，大革命的成功及其扩散作用，在在引导并支配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行动。

（责任编辑：徐秀丽）

（作者陈三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① 汪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

②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